



南开大学民族研究文库

民族政治学论集

В. А. 季什科夫 / 著

高永久 韩莉 / 译



MINZUZHENGZHIXUELUNJI (ЭТНОЛОГИЯ И ПОЛИТИКА)

民族出版社

DO-05
7



南开大学民族研究文库

MINZUZHENGZHIXUELUNJI (ЭТНОЛОГИЯ И ПОЛИТИКА)

B·A·季什科夫／著 高永久 韩莉／译

民族政治学论集

民族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 - 2009 - 053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政治学论集/ (俄罗斯) 季什科夫著: 高永久, 韩莉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105 - 09939 - 9

I. 民… II. ①季…②高…③韩… III. 民族学: 政治学 - 文集 IV. D0 -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0076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bs.com>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250 千字

印数: 0001 - 1500 册 定价: 20.00 元

ISBN 978-7-105-09939-9/D · 1540/ (汉 243)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中文版前言

为什么中国读者会对这本书感兴趣？为什么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对我这个作者非常重要？20世纪末最后十年，俄罗斯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其内容不仅仅局限于国家疆域的改变、市场改革和政治体制的变革。人们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社会意识、人际关系、个人行为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的民族成分、文化多样性、族际关系的性质和有关“民族问题”的国家政策，即民族政策，也都受到了深刻影响。现在的俄罗斯是一个全新的国家和社会，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尽管历史和传统，包括苏联时期的遗产，对国家的发展进程产生着巨大影响。

与宏观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分析不同，本书以一个民族学家或者社会文化人类学家的视角客观地看待现在的俄罗斯。与传统的仔细研究各个小社会的民族学方法不同，我感兴趣的是，与其他国家比较下的整个俄罗斯的发展进程。虽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人口具有民族多样性的特点，但她仍然和世界上许多大国一样，拥有不同民族出身和宗教信仰的人们。此时，重要的不是人口的文化多样性这个事实本身，而是社会和国家赋予人口的文化多样性这个因素什么意义。在这方面，俄罗斯的历史经验的确非常独特，其结果也不尽相同。

在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们的民族差别具有特殊意义，各民族同一体被称做“各民族”，而一部分国家制度就是按民族区域原则建立的。这有助于保留小文化和小语种。现在，俄罗斯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主要以非俄罗斯民族（少数民族）民族区域内部自治的形式存在，这些共和国和自治区是保留和发展小文化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的基础。但是，现在的俄罗斯继承了原苏联的民族共同体理论和“多民族组成”形式。放弃公民国家的思想，不能把俄罗斯的联邦构成解释为实现俄罗斯的民族国家自治。

苏联解体后，原加盟共和国（即民族区域自治构成）的边界问题，在

国家内部自由主义思想盛行的情况下,在国家外部新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影响下,原加盟共和国(即民族区域自治构成)之间的边界问题导致俄罗斯的“民族问题”尖锐化,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意义。在车臣,少数民族制定了武装分离主义计划,通过了地方宪法和法律,俄罗斯作为联邦国家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极端民族主义控制的政治实践开始在各个地区展开,出现了歧视“非主体”人口的现象。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分析民族因素在俄罗斯的作用,以及国家生活中发生的其他一些重要事情(人口、移民、冲突、极端民族主义、宽容及其他一些问题)。但对我本人和国家而言,其他国家的经验,其中包括中国的经验,是极其重要的。中国支持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政策尤其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中,民族区域自治形式的存在与中国的存在不矛盾,中国的存在不是由民族决定的,而是由全体公民民主决定的。占多数民族——汉族和汉文化的存在,不会排斥,更不会拒绝全中国人民对国家的一致忠诚。

对俄罗斯而言,这种模式具有重大意义,也许是拯救俄罗斯的良方。换言之,不应当以俄国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典型方法,而应当以确立俄罗斯统一和确立俄罗斯人为国家民族的思想和计划,对抗地方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当然,俄罗斯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汉族的民族主义一样,在两国的社会生活中都存在,但其内容可以并且应当向包容性、公开性和尊重文化复杂性的方向转变。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将来不会支持文化分立主义,而会支持文化多样性情况下的国家统一。实际上,俄罗斯不仅存在 100 多个不同民族,而且也存在一个统一的民族,这就是俄罗斯人国家和文化的一致性,但要使俄罗斯学术界和政治界意识到并承认这个现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在中国、印度、墨西哥、西班牙和其他国家,存在着“多民族统一”的形式,在探索新的统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验将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益处。

我决定将几篇没有发表过的纪实性文章编入本中文版译著。其中包括两篇有关车臣战争的纪实(2002 年,我用这个题材在科学院出版了一本名为《武装冲突中的社会——车臣战争的民族学》的小册子),两篇有关散居在国外的俄罗斯人和有关恐怖主义的纪实,这两篇纪实是

在该书俄文版出版后写的,并且为该书释义部分增添了一篇文章《民族主义》。

事情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尽管我的老同事谢尔盖·齐赫文斯基不止一次对我说:“每一个人都应当到中国去看看”。我这本书可能赶在我访问中国之前出版。为此,我要感谢高永久教授,他建议我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并且由他亲自来做这件事。

瓦·季什科夫

2002年7月16日

瓦·季什科夫教授访谈录

访谈主持人: B. B. 科兹洛夫斯基(下略)

问: 民族学领域的重大学术研究是与您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同时, 您任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部部长时, 曾参与过政策的制定。您是如何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领域结合在一起的? 为什么这种情况能够长期继续?

瓦·季什科夫教授(下略): 1992年2月, 根据总统令, 我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民族事务部部长, 我任此职到1992年10月中旬, 同时仍兼任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当时的俄罗斯政府认为, 必须组建单独的政府部门, 以落实国家在民族关系方面的政策和对其进行管理, 确切地说, 是为了落实俄罗斯的少数民族政策, 即民族政策。在民族问题迅速政治化、联邦中央与民族自治区(共和国)的关系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 新政府部门的建立, 不仅要保证该社会生活领域的国家管理机制, 而且要在现代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有关民族政策的新观点和新思想。在深刻变革的背景下, 新部门吸纳部分专家是必要的, 但政治生涯的短暂性提醒我, 需要继续保留研究所所长这一职务, 需要继续进行一些科学研究工作。

政策和科学的确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是两个不同的人类活动形式, 在这两者之间始终保持着距离, 但同时两者不能单独存在。社会科学工作者置身于政策和政府机关影响范围之外, 只是一个神话, 《罗斯编年史》编纂者已经推翻了这个神话。不科学的政策, 即没有进行必要的理论研究和论证, 不正确的和非有效的政策, 将导致资源的浪费和产生毁灭性的矛盾冲突。虽然我不是“科学管理社会”陈词滥调的拥护者(政策的形成不仅仅靠科学, 而且还要靠其他因素), 但我坚信, 对政策而言, 没有什么东西比好的理论更实际。站不住脚的理论、伪科学的构思, 甚至矛盾的语言, 会使政策产生矛盾。但是, 达不到理论上的纯

洁,是常有的事,因为大众的意识,受过旧式教育、不愿意重新学习的人的情感,是有惯性的,情感上和政治上有浮夸言辞,马上摆脱这种惯性和浮夸言辞非常困难,科学和政策之间、学者和政治家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妥协。

当然,这种妥协、矛盾冲突只是个人层面的。国家委员会门前挂的“国家民族政策委员会”牌子(在我被任命为主席之前,该委员会已经成立)曾使我心里不愉快。也许,我是极少数认为这个术语不合适的人,因为“民族政策”是保障国家和全社会各民族利益的政策。但在1992年,我能做到的充其量不过是将该部门的名称改为“民族事务委员会”。在我担任部长后,我想用的词汇仍然是“政策”。甚至在一些简单事情上,如部门的名称,都可能包括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国家管理的内容。

1990年,在国内民族主义^①极盛时期,放弃这个术语是不可能的。只是在十年后,我才认为公开建议谨慎使用“民族的”这个术语是可能的,哪怕是在纯理论语言层面上,同时不隐瞒全体公民和国内对这个术语的理解。我认为,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有关“民族政策”或“有关俄罗斯民族的政策”的表达,将向更正确的方向前进。

关于成为政治家的学者们的命运,存在着另一个矛盾冲突,也就是说,必须掌握政治家的行为举止标准,掌握国家管理的方法。我简单地把它分为单声部和多声部:一个部应当只有一种声音,而对理论界来说,这类似于死亡。因此,在部里,从早到晚都应当保持一长制原则和一种立场,而在研究所,应当支持理论自由的原则,本人在遵守这一原则的同时,身心也得到了放松。我与主管我的副总理B. 马哈拉泽(B. Махарадзе)发生过一次争吵,这是我50岁时第一次听到针对我的极其粗野难听的话(对许多俄罗斯政治家来说,是极其平常的语言)。

^① “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所做的历史的具体分析,主要体现在列宁把民族主义区分为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这种两分法上。”(宁骚著:《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第9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译者注。

也许,我能够承受兼任两个职务带来的压力,虽然非常清楚,我不会“植根于”政治,尤其是不会与一定的政党发生联系。我自愿退出叶利钦一盖达尔内阁的原因,与其说是难以接受的外部环境(总统的作风、理解和支持不够、与其他“新民族政策制定者”不必要的竞争等),不如说是在执行法律和法令方面我内心里的矛盾。我觉得,从学术角度看,这些法律和法令往往是站不住脚的。我举两个例子。我没有签署过有关哥萨克人的总统令,因总统令是叶利钦签署的,只是委托我执行。至今我仍认为,不应当给到克里姆林宫参加人民代表大会的哥萨克人发放通行证,不应当把穿哥萨克服装的 С. М. 沙赫赖(С. М. Шахрай)的照片刊登在《首都》(Столица)杂志的封面上,国家不应当在克里姆林宫成立有关哥萨克事务司或其他官僚机构,可以把这种社会动员形式保持在基层动员的水平上,不允许成立平行的国家机构。说实在的,哥萨克仍然停留在民间—乡村水平上,谢天谢地,它最好保持现在的形式。否则,在“哥萨克游戏”上,国家和政府机关将花费大量的资金、时间和情感。

其实,在各种民族动员形式方面,年轻的俄罗斯政权(把持政权的是受老式教育的人)奉行的是毫不怜惜的战略,接受了(不乏学者们的帮助)所谓的“民族运动”、“民族复兴”的现实,把它们看做决定社会变革的深刻的历史规律。1992年,现代人类学家的惯用语“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或“国家也是部落,只不过拥有军队”使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要知道,Б. 安德森(Б. Андерсон)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①一书已经翻译成俄文,尽管只是到2001年才出版,然而我国的理论集团和政治集团都应当去读一读。

对民族现象复杂性及其政治表现的不理解,常常暴露出特殊的“民族问题敏感性”,而通过象征性方法和谈判机制的管理地位和象征性的领域,总是处在俄罗斯政治俱乐部理解的范围之外。我在《心中的烈

^① 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另见: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9。——译者注。

火——苏联解体后的民族、民族主义和冲突》一书序言里写道：“对一个成为政治家并在充满教条主义和悲剧性事件环境中做事的学者来说，必须善于区分浮夸言辞与现实利益之间的差别。”在俄罗斯政府里，我不是唯一来自理论界的政府成员，但那些与民族关系有联系的人并未吸取这个教训。重新学习和坚持己见，是我所力不能及的，于是最终只有选择辞职。

我仍然合理地看待在政府的工作经验、学术与政策的协调一致问题。其一，几乎我的所有基本思想和研究都得到了应用，尽管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实现；同时，也不是理想的形式，显然在现实生活中这并不可能。1996年通过的《国家民族政策构想》和《联邦民族文化自治法》是现俄罗斯民族政策的基础。起初，这两份文件都是由我撰写的（我仍保存着草稿），但在1992年，通过这样的构想和法律却比较困难。通过加工和妥协，它们是可以通过的。一个学者对自己思想和政治建议的间接及迟到的影响力应当有所准备。对我个人来说，在政府里做事是一项没有价值的“野外调研”。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优点和缺点，影响政府机关的条件和因素，对于俄罗斯社会进程的本质，我能够理解。由于这种理解，我不认为有必要加入到反对派的行列，并且继续与政府机关合作，尽可能地施加影响。这是我的国家和我们的政府机关，其中包括政治家的能够从我的文章中读到的思想和建议。

问：毫无疑问，我们的读者感兴趣的是，您是怎样一位社会科学工作者？您走过了什么样的科学道路？什么对您的职业选择产生了影响？您工作的优先方向是什么？准确地说，您最喜欢的学科是哪一门？如，民族学？民族社会学？社会和文化人类学？

1964年，我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西欧和美洲国家近现代史教研室，当时教研室主任为 И. С. 加尔金 (И. С. Галкин) 和 Е. Ф. 亚济科夫 (Е. Ф. Языков)。我特别感谢后者。三年级初，在一次苏共史（起初我选择的是这个专业）课堂讨论中，发生了激烈辩论。当时，我读过美国进修生马尔金·马利亚 (Мартин Малия) 私下里给我的伊萨克·多伊切尔

(Исаак Дойчер)撰写的《斯大林——政治生涯》一书,引出了镇压与极权主义这个话题,苏共史教研室给我下达了逐客令。Е. Ф. 亚济科夫让我转到他的教研室学习,于是我开始专攻美洲学。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是在已故 Д. Е. 梅拉米德(Д. Е. Меламид)和 Г. Н. 谢沃斯季亚诺夫(Г. Н. Севостьянов)的指导下完成的。(1962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谢沃斯季亚诺夫对我说:“瓦列里,我要把你培养成一名历史学家。”)

我后来成了一名历史学家,并且现在仍然是,尽管最近20年对历史上民族因素的兴趣把我带进了另一个学科——民族学或者社会文化人类学。我的早期著作,和两篇学位论文一样,写的是早期北美史,准确地说,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加拿大史。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我的指导老师为已故 А. Л. 纳罗奇尼茨基(А. Л. Нарочницкий)院士。他是一流学者,学识渊博,严肃学院派的捍卫者(“事情是怎么样就怎么写”;“好的历史著作是可信的,尽管一半篇幅为注脚”)。在我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的宴会上,他说:“我和我的学生一起研究加拿大史”。他的话是正确的,给了我选择和解释的自由,甚至不坚持把列宁的话写入我的文稿。

虽然我毕业于国立曼加丹列宁师范学院,但我始终与苏联科学院通史研究所保持着联系。当时的美国史研究室主任为 Г. Н. 谢沃斯季亚诺夫(Г. Н. Севостьянов),他鼓励我在研究室编辑的《美国年鉴》上发表著作和文章。现为院士的 Н. Н. 博尔霍维季诺夫(Н. Н. Болховитинов)对我产生过巨大影响,他撰写的有关美国史和俄美关系的著作闻名全世界。

国立莫斯科大学毕业后,我立刻前往曼加丹师范学院,在该学院当了几年教师。此后,我研究生毕业,返回莫斯科,到通史研究所美国和加拿大史研究室工作。在极北地带工作了约5年,其中包括任师范学院历史语文系主任,这使我在扩大职业眼界和社会经验方面收获颇丰。现著名历史小说家沃尔德马尔·巴利亚津(Вольдемар Балязин)和现《Pro et Contra》杂志编辑 М. П. 帕夫洛娃-西尔万斯卡娅(М. П. Павлова-Сильванская)都曾是我在曼加丹工作时的同事和朋友,足以说明这一点。我曾与北部少数民族大学生以及来自雅库特的少数民族

大学生一起工作过,这使我对活的民族学,准确地说,对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在通史研究所工作了几年。1976年,时任研究所所长和历史学部秘书的Е. М. 茹科夫(Е. М. Жуков)院士邀请我担任历史学部学术秘书。我在科学院主席团办公室从事这一相当有意思的行政工作约6年,当然没有停止过对加拿大史的研究。1979年,在通史研究所,通过了“加拿大殖民地的解放运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与Е. М. 茹科夫院士、Б. Б. 皮奥特罗夫斯基(Б. Б. Пиотровский)院士和С. Л. 齐赫文斯基(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院士一起工作,以及与许多著名苏联历史学家的交往和参加历史科学领域的组织协调工作,对我历史学专业的形成起到了帮助作用。我撰写了《加拿大史》和《美国历史与历史学家》等学术性、史学性专著。

在那些年里,我又产生了两个新的兴趣:一是在研究领域,采取历史数字方法;二是在美国印第安人史研究领域,与И. Д. 科瓦利琴科(И. Д. Ковальченко)院士进行合作。第一个兴趣没有形成个人学术研究著作,仅局限在苏美联合委员会范围内的工作:组织一系列国际研讨会和出版苏美历史学家集体完成的两部专著。然而,认识这个问题和结识从事社会史、农业史研究的学者,引起了我对历史研究方法和社会变革基本理论的兴趣。

1982年,应Ю. В. 勃罗姆列伊(Ю. В. Бромлей)院士之邀,我转到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工作,任美洲民族学部主任,Ф. 博厄斯(Ф. Боас)的学生、著名美国印第安人研究员Ю. П. 阿韦尔基耶娃(Ю. П. Аверкиева)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И. Р. 格里古列维奇(И. Р. Григулевич),都曾是我的前任。从一门学科和一个研究领域转入另一门学科和另一个理论研究领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这是由我本人的传统和个人职业联系所决定的,这种传统和联系是多年来在联合野外调研和联合著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我非常高兴地开始掌握民族学研究方法和国内民族学理论,从事北美印第安人问题和美国、加拿大其他民族问题的研究。1980年,尽管出国考察受到限制,我还是到这两个国家的许多地区,尤其是村社,进行了野外调研(夏威夷群岛、阿拉斯

加、加利福尼亚、不列颠、哥伦比亚、魁北克、加拿大极地、大湖地区等)。和研究所的同事一起,撰写了两本有关北美土著居民现状的著作,也为定期举行印第安问题研讨会打下了基础(在我的主持下,编辑出版了5本《研讨会材料汇编》)。

在研究所里,我得到了许多著名专家的支持:已故 В. П. 阿列克谢耶夫(В. П. Алексеев)院士、С. А. 阿鲁秋诺夫(С. А. Арутюнов)通讯院士、С. И. 布鲁克(С. И. Брук)教授,当然还有 Ю. В. 勃罗姆列伊。我始终认为,在阐述个人方法论和个人爱好的同时,要关注学术的继承性问题和对老一代科学家的了解,这是学术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对我国民族学界优秀学术带头人进行了一系列谈话和采访[Л. П. 波塔波夫(Л. П. Потапов)、Т. И. 日丹科(Т. И. Жданко)、С. И. 布鲁克、К. В. 奇斯托夫(К. В. Чистов)、Е. П. 布瑟金(Е. П. Бусыгин)],我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就这一系列采访,专门写一本书。采访本身是本学科范围内自我反省的一种尝试。我的工作的意义在于,在《民族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出版了一批有关国内外人类学经典作家、民族学经典作家的优秀评论著作。

20世纪80年代末,我积累了大量有关北美土著居民现代地位问题的材料,但没有撰写成书。问题在于生活本身:国内事件要比国外课题更重要、更有意义。况且,1988年,我被任命为民族学研究所副所长,1989年,被任命为所长。国内的形势和我的职务决定,必须研究国内课题,即民族关系问题,以及所谓的民族政策、民族政治学、民族冲突。1989年,我在《共产党员》杂志上发表了《民族与国家》一文,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祈祷文要更改——论民族关系理论和实践的新观点》的小册子(该小册子以1989年10月1日在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会议上的讲话为基础),此后又写了许多有关人民代表大会和苏共28大民族成份的文章。1991年后,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现象,对国家民族政策方面的新观点,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

问: 在民族学、理论民族学、民族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之间,是否存在不同点和相同点? 表现在什么地方? 在现代科学中,这些

流派的独立发展是否有意义？

也许，在俄罗斯深刻变革的条件下，作为研究所所长，我面临的问题是确定学科的界限和地位，奠定学科的理论基础。这个学科以前等同于民族学，根据对历史科学次学科原先的分类，这个学科至今仍然被称做民族学。我非常清楚，在现在的世界背景和人文学知识名称录中，在我国的社会知识中，出现了一些合理的变化，导致许多学科发生变化，旧的学科消失，出现了新的兴趣和新的信息，所谓的传统民族学受到了极大冲击。以前，我对国际民族学家界和人类学家界相当熟悉，曾参加过在魁北克、温哥华（1983年）、萨格勒布（1988年）和墨西哥城（1993年）举行的世界人类学和民族学代表大会，在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协会副会长，在威廉斯堡（1998年）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新的任期为5年。

看来，作为旧的、完全有理由的学术理念，民族学是可以存在的。世界承认俄罗斯民族学家是“自己人”，即理论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有一点似乎已经非常清楚，国外人类学家，如博厄斯（Ф. Боас）、马林诺夫斯基（Б. Малиновский）、米德（М. Мид）和列维-斯特劳斯（К. Леви-Стросс），和我国民族学博物馆和民族学研究所的 В. Г. 塔恩-博戈拉兹（В. Г. Тан-Богораз）、Л. Я. 施坦恩伯格（Л. Я. Штернберг）、А. Н. 马克西莫夫（А. Н. Максимов）、Д. К. 泽列宁（Д. К. Зеленин）、М. Г. 列文（М. Г. Левин）、Л. П. 波塔波夫（Л. П. Потапов）、В. О. 多尔吉赫（В. О. Долгих）一样，都是该学科的代表人物。但是，这显然远不是全部代表，也远不是没有原因的。最近几十年，在研究文化多样性方面，世界各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毕竟走得太远，早已不仅仅局限在民族问题的范畴。俄罗斯传统是把这门科学严格限定在民族论题和民族学方法范围内。甚至在研究技术灾难（乌拉尔核电站事故）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时，研究者感兴趣的是称谓“民族共同体和辐射”。例如，在我们研究所，研究民族社会学，即通过社会学咨询的方法研究民族问题已很难适存。事实上，应当给予该流派的创始者们（Ю. В. 阿鲁秋尼扬、М. Н. 古博格洛、Л. М. 德罗比热娃）以应有的评价，他们使该学派几乎成了理

论民族学与社会学结合部上一个独立的学科。虽然今天的学科界限在方法上变得相当程式化,因为现代“内行社会学”越来越表现出对民族学方法的兴趣。这种方法仍然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商标”。

但是,“人类学”一词本身以前也具有双重意义。除学科的基本含义外,出现了其他一些学科,如综合研究人的学科(哲学人类学),以及研究大型人群日常生活史、历史、文化背景的学科(历史人类学)。许多人,甚至电视节目主持人,都喜欢用“人类学”这个词汇。应当承认,人类学家本身(我指的是外国的)过分地扩大了自己的科学视野,致使大量“新人类学”的出现。物理人类学发展为多个流派,开始具有更广泛的表现,如“生物人类学”。在个别科学学会和委员会层面上,进行了更明确的划分,甚至增设:城市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应用人类学、法律人类学、视听说人类学等。西方人类学家开始抱怨:现在几乎所有人文学知识领域都叫人类学,应当更明确地划定本学科的界限,为的是不使学科特征丧失。

近20年来,出现了人类学地理扩张现象:从研究人员的认同和教育机构的标志看,它已从欧洲扩展到全世界。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出现了新的民族人类学学校。尽管大都是英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以及印度、中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学者,但在个人定位和科学贡献方面,他们形成了新的、无与伦比的一代。

20世纪90年代,最后一个堡垒——东欧理论民族学和民族学学科轰然倒塌,波兰、匈牙利、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同行们开始称自己为社会人类学家或者文化人类学家,学院、系和教研室的名称也被更改了。1992年,在不列颠人类学家亚当·库珀尔(Адам Купер)的倡议下,成立了欧洲社会人类学家联盟,部分是为了与美国人类学扩张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也是为了把从“共产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东欧学术界纳入西欧社会人类学的范畴。我们民族学研究所的代表首次参加在科英布拉(Коимбра,葡萄牙)举行的成立代表大会,这不是没有原因的。遗憾的是,我没能参加这次大会,没能成为这个现在最强大的欧洲社会人类学家联盟的“创始人”。近几年来,在欧洲社会人类学联盟代表大会上,我国的理论民族学家让位于那

些国内新出现的学者,他们为自己的东方学、历史语言学、考古学、政治学或社会学自我类别化补充了人类学的定义,他们在报告学术研究成果时,总的看来不像“白乌鸦”。^①

考虑到迅速变化的历史背景,学术界自我认同的变化和先后顺序的变化,显然已经输入俄罗斯。尤其是在马列和科学社会主义综合教学领域,数千名学者失去习惯的学科环境,他们将不得不寻求新的课题范围、地位和标志。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我们自己不进行高质量的扩展,那么就要冒被裹在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民族学外衣”里的风险,而那些自己为人类学下定义的人将成为俄罗斯的人类学家。结果大体上如此,社会学界个别积极分子提出的概念,以及因主管部门领导监管不力而“冒出来的”国家“社会人类学”教学标准,与人类学的关系非常有限。

在教育服务市场上失去自尊和过于自信的俄罗斯民族学家,在自身现代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迈出这一步却困难重重。21世纪初,我倡议将民族学研究所更名为理论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这必然导致学科名称的改变和职业民族学界有益的矛盾冲突。一部分人在名称改变中看到了“古典民族学”的垮台,另一部分人非常乐意接受“理论民族学”这种新的表述,第三部分人准备用社会人类学家或文化人类学家的称谓表述自己,第四部分人(物理人类学家)和以前一样,仍是人类学家,只是有点不安:除他们以外,出现了“另类的”人类学家。

我的观点是,此类变化不应通过政府决定的方式。那些希望自己仍然是民族学家的人不应当拒绝别人称自己为理论民族学家。顺便说一句,我们这个领域一些专家的工作性质正是集中在民族学上。但是,对我来说,什么是民族学?民族学是理论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在野外调研,也包括民族学描述本身。民族学是一个学科的社会基础,人们称它为“理论民族学”(俄罗斯传统,部分也是欧洲的传统)、“社会人类学”

^① 白乌鸦(“белая ворона”)——喻特别的人,标奇立异的人。参见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辞书研究所编:《大俄汉词典》,修订2版,2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译者注。

(西欧传统)、“文化人类学”(北美传统)。但是,在现代世界,包括在俄罗斯,仍然有一大批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在从事民族学研究,同时他们没有停留在“理论大门”之前,而是以这个大门为依托去探索理论,只是没有把它看做有重大意义的钥匙。首先,我指的是人数众多的民族学博物馆工作人员队伍,包括不断增长的地方博物馆、乡土博物馆和露天博物馆工作人员,以及在民族文化生产部门(手工艺、商业时装表演、工艺品艺术设计等)和消费市场民族偏爱方面从事研究的专家。在理论机构,有一批坐办公室的学者,把他们定为民族学家更合适一些,也许,他们拒绝如此公正的定位太过于草率。俄罗斯科学院理论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从事当地人数较少民族人口经济区历史民族学研究、确定实用发展目标、对计划和项目提供经济及法律保障的学者“做的是民族学”或“应用人类学”。

为了更广泛地理解这个科学和教育工作领域,我国主要职业联盟的名称叫“俄罗斯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联盟”。十年前,即把我国所有民族学家划入理论民族学家的范畴之初,我曾认为这件事是不合适的。在理论研究所,曾经有一些旧名称的坚定拥护者。现在,理论民族学家和理论民族学更有信心了,但我本人此时却有点担心,研究者最好不要放弃对民族学的研究,不要失去对它的兴趣。根据对武装冲突带来的社会问题的研究,我刚刚出版了一部著作,副标题为“车臣战争民族学”,因为该书 552 页中有三分之一是“直接声音”,即受访者的证言,其学术思想和影响力一点也不比作者的叙述小(也许,甚至更多)。我用这本书向自己证明,我能进行民族学研究,而且是用民族学界不准许的极其复杂的方式。如果说到理论民族学、民族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单独存在的思想,那么作为一门科学,民族社会学是不存在的,理论民族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义词,尽管后者的研究范围更宽一些,但方法却只有一个。

问: 您如何评价俄罗斯和国外的理论研究、经验研究情况? 在您看来, 现代世界和俄罗斯的理论民族学将向什么方向发展?